想象与错位：镜像理论视角下《人生》中高加林的身份焦虑

周子珊

摘要：本文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为框架，探讨《人生》中高加林的身份焦虑及其悲剧成因。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背景下，高加林试图超越农村身份成为真正的城市，但其自我认同却陷入“想象界”的误认与“象征界”的规训间的张力之中。他的身份认同不仅依赖于他者的凝视，还受到“大他者”——即城市文化规范与社会秩序的深刻塑造。在这一过程中，高加林在农村空间中通过巧珍的依附性获得自尊，而在城市空间中则通过黄亚萍的知识性寻求完美伴侣，情感的不协调最终导致了爱情的悲剧。另外，高加林的文化品位并未真正赋予他稳定的社会地位，在城乡社会结构的限制下，最终导致身份的裂解。高加林的悲剧不仅源于个人选择的困境，更是城乡社会结构固化的必然产物。本文基于精神分析视角，剖析高加林的心理机制及身份构建过程，进而探讨城乡二元对立下个体命运的困境与可能的突围路径。

关键词：镜像理论；《人生》；高加林；身份批评

Imagination and Displacement: Gao Jialin’s Identity Anxiety i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rror Theory

Zhou Zishan

Abstract: Taking Lacan’s mirror theory as its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Gao Jialin’s identity anxiety and the causes of his tragedy in *Life*. Against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Gao Jialin attempts to transcend his rural identity and become a true urbanite, yet his self-identification falls in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misrecognition of the “Imaginary”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ymbolic.” His identity is not only dependent on the gaze of the Other but is also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big Other”—that is, urban cultural norms and social order. In this process, Gao Jialin gains self-esteem in the rural space through Qiaozhen’s dependence, while in the urban space he seeks a perfect partner through Huang Yaping’s intellectual qualities; the dissonance in emotion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tragedy of love. In addition, Gao Jialin’s cultural taste does not truly grant him a stable social statu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urban-rural social structure, it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identity. Gao Jialin’s tragedy originates not only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personal choice but is also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ossification of the urban-rural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Gao Jialin'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redicament of individual destiny under the urban-rural binary opposition and possible paths of breakthrough.

Keywords: mirror theory; *Life*; Gao Jialin; identity criticism

“城乡交叉地带”一直是路遥创作的重要特征，并在1982年的中篇小说《人生》中首次得以集中展现。作为一位带有强烈自我投射意识的作家，路遥笔下的“城乡交叉地带”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而且更深层地指向一种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的复杂纠葛。“农民血统”是路遥自我指认的起点，也是其乡土叙事的重要印记。对于农村的依恋与对城市的向往构成了路遥创作心理的二象性，徘徊在其间的焦虑心态也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人生》中，高加林便是这一矛盾最为集中的承载者。

作为路遥的成名之作，《人生》于1982年在《收获》上刊载后，迅速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同样面临城乡流动困境的农村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广泛共鸣。同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人生》单行本，又掀起一轮传播热潮。由于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关于《人生》的现有研究多集中在路遥创作论、身份政治、城乡文化差异等宏观视角上，而从精神分析角度切入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仅有黄梅学《路遥小说的精神分析》和李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路遥创伤心理研究》，分别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路遥整体作品或者作者心理；而具体到以《人生》主人公高加林为研究对象，多数考察集中在简单的形象或性格分析上，以精神分析为视角的讨论更为有限。目前只有卢晓霞的《人生的困惑——高加林爱情悲剧的精神分析》指出其“本我—自我—超我”的三重人格冲突，但缺乏其性格成因及深层心理结构的分析；武风云《精神分析批评视角下的高加林》一文，虽涉及其自负与自卑的性格特质，却未深入探讨此性格的社会心理成因。事实上，“高加林难题”的广泛讨论，证明《人生》中呈现的困境并非个例。即使在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城乡二元对立的关系已较过去有所缓和，但通过对高加林性格的深入剖析，仍能提供一种精神性的借鉴。基于此，本文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为框架，通过把握高加林、巧珍、黄亚萍爱情关系的复杂动态性，探讨高加林人格的形成机制及内在矛盾，并进一步分析这种身份焦虑如何最终导致他的人生悲剧。

法国哲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通过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新解读，在1936年提出了“镜像理论”，并进一步构建了“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三界模型，以阐释个体的主体性如何在语言、文化及社会秩序的影响下形成。拉康认为，婴儿在6—18个月大的时候，会经历一个“镜像阶段”，通过在镜子中首次认出自己，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自我形象，而这种“自我”来源于想象的建构，是个体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塑造出的“理想自我”，并不真实，即“误认”。这一过程构成了“想象界”（the Imaginary），即个体通过“小他者”（the Little Other）——通常是具体的他人，如母亲、同伴或社会环境——来认识自己。在想象界中，主体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自身存在，因而其自我认同本质上是建立在他者身上的。镜像阶段后，个体进入“象征界”（the Symbolic），即由社会语言、文化规范、法律及伦理所构成的秩序。在象征界中，个体受到“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规训，必须按照社会的规则建构自己的身份。这一阶段，主体不再仅仅依赖具体的“小他者”来确认自我，而是被更抽象的符号系统所塑造。而主体的欲望在此本质上就是“大他者的欲望”，即试图迎合或占据大他者设定的位置[①]。由此，拉康的镜像理论揭示了个体主体性构建的动态过程，即从依赖外部认同的“想象界”过渡到受社会规

① 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学术交流》2006年第7期。

训的“ 象征界 ”，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认同，同时也陷入对“ 大他者 ”认可的永恒追寻与欲望的错位之中。

一、依附与自尊：农村空间中的自我想象

高加林倔强、好面子、有极为强烈的自尊心，这种性格受到传统农业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土地塑造了农民的主体意识，日复一日的土地耕作促使农民培养出自食其力的思维传统，这种经济独立性强化了他们的自主观念；另一方面，在农村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形成的“ 差序格局 ”中，个人的社会评价往往直接影响其家庭乃至家族、村落的声誉，“ 面子维护 ”的观念导致农民尤其看重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被认可度。高加林虽然“ 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 ”[①]，但仍然深受农村传统男性中心论的影响，这种性别意识和他强烈的自尊心紧密交织。

在与巧珍和黄亚萍的关系中，高加林都表现出了对于“ 顺从女性 ”的偏好。他第一次对巧珍感受到情感上的波动，是因为看到巧珍“ 她仍然害羞地低着头，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依恋在他身边 ”。[②] 此前他们交流并不多，除去卖馍事件，没有建立感情基础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加林的感情认同就是确立在对方“ 温顺 ”的基础上。路遥笔下的巧珍是传统的农村女性，即使她流露出对现代文化的渴求，也基本是以高加林为前提。刷牙事件，是区分先进与蒙昧的卫生性标志。在巧珍这里，仅仅只是“ 因为这是亲爱的加林哥要她这样做的啊 ”，“ 她为了加林的爱情什么都可忍受 ”[③]。这种以牺牲自我独立性为特征的依附式爱情，显然是高加林需要的。在他和巧珍的关系中，高加林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男性气概，满足强烈自尊心：“ 加林是骄傲的，让一村满川的庄稼人看看吧！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著名的‘ 财神爷 ’刘立本的女儿，正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一般，温顺地跟在他的身边！ ”[④] 通过“ 他者 ”巧珍的依附性顺从，高加林的高位身份得到了确认，重视尊严的那部分自我一旦得到充分满足，高加林也逐渐从被撤掉教师职务感受到的屈辱与低沉中恢复过来，甚至开始不再抗拒与土地的联系：正常劳动、卷旱烟吃、改成农民方言、说粗鲁话，“ 俨然像个过光景的庄稼人了 ”[⑤]。

对比黄亚萍，书中多次提到高加林不喜欢黄亚萍的“ 任性 ”，而这种“ 任性 ”实际只是高加林的理想自我在抵触：“ 他和她在一起，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她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萍不是这样。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 ”高加林对这种身份高低位的转换感到不适，因为由巧珍确立并强化起来的高自尊，在和黄亚萍的关系中无法满足。“ 雨中丢刀 ”事件，让高加林和黄亚萍爆发了巨大的冲突，就是因为高加林经常性地感受不到对权力的掌控，因此他才会回忆起巧珍的乖巧，借此进行幻想性的自我满足。

事实上，高加林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矛盾性：他渴望城市身份，并在心理上始终抗拒成为“ 农民 ”，但在现实中，他的自我尊严、社会价值感和心理满足，却依赖于农村空间的文化结构。县城的读书经历让高加林建立了一种“ 城市性 ”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不仅仅体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

① 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7 页。

② 路遥：《人生》，第 50 页。

③ 路遥：《人生》，第 56 页。

④ 路遥：《人生》，第 102 页。

⑤ 路遥：《人生》，第 71 页。

更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种对自身身份的特殊认知：即他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具有文化资本、应该属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高加林的自尊心离不开城乡对立的背景，两个空间的并置，产生了身份对比的可能性。高加林对于城市的现代性想象，某种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农村空间作为“他者”，只有在农村愚昧、落后的环境下，他才能感受到自己是个懂现代医学的“城市人”（卫生事件）；而在和真正的城市人爆发冲突之时，他又觉得自己属于农村人了，比如和黄亚萍吵架，“我那时黄尘满面，平顶子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①] 显然，高加林的高位想象，比起对自身的能力认可，更需要他者作为锚点定位。

然而，正如拉康指出的：镜像阶段时，他者提供的认同和欲望的满足，总是暂时和不完整的。主体通过小他者构建的自我形象，并不能真正填补内在的缺失感，这种缺失正是由象征界的“阉割”所导致的。当高加林在农村空间中重新稳定下来，开始接受自己的现实时，城市的影子再次浮现。如果说“卫生革命”只是引子，那么和克南妈妈的冲突成为唤醒他的重要节点，高加林的自尊在来自城市人的歧视性辱骂中被再次瓦解，他意识到自己的“城市性”无法在农村得到真正的实现，进而引发了再一次的身份焦虑。

二、品位与符号：城市文化下的身份错位

高加林的中学时光是在县城度过的，这段经历不仅改变了他的知识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身份认同。自从去县城读书后，高加林很快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城市人”，这种转变显然跟户籍层面上的合法性身份无关，而是指城市文化对他的塑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村工作者“把愚和病贫连接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②]，这种“愚”无关智力，而是指知识层面的匮乏。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界限，除了在由经济结构和卫生条件引发的外表特质上显现出来，如在刻板印象下认为农民是“不干净”和“邋遢”的，最主要就是通过知识结构区分。通过多年的学习，高加林在知识层面上已经和真正的城市人无异；在城市空间中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品位，恰恰是他完成城市身份认同的最重要途径。这种认同对于高加林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许多现代生活习惯，而且还会有意识地通过某些行为方式加深自我认同，区隔农村文化，通过自我改造来迎合一种想象中的城市人形象。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正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的规训与塑造。

在象征界中，个人的自我认同并非来源于自身的本质，而是通过对“大他者”即规则、秩序的模仿和对其期望的迎合来确立的。在高加林的成长过程中，城市正是他所依附的“大他者”——它不仅代表着文化、知识和现代性，更是他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在县城那个拥有学校、电影院、商店、泳池等现代设施的空间，高加林形成了对自己是个“文化人”的认知：“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③] 与农村相比更为先进的知识文化体验，刺激着高加林的认知，让他试图按照“城市人”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如果经济条件无法改变，那么只能通过模仿文化品位，将城市文化的符号内化到自身，以此区别于农村社会，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

① 路遥：《人生》，第 185 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年，第 10 页。

③ 路遥：《人生》，第 26 页。

这种身份认同的建立，使得他对与农民身份相关的符号极为敏感。比如，他在被撤教师职务后，迫于生计进城卖蒸馍，却无法像普通小贩一样大声吆喝，“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在高加林的认知体系中，这种行为和农民身份高度相关。后来他跑到无人的山沟进行练习，即使没有外界的凝视，在喊出声音的那一刻他仍然觉得无比“悲哀”，眼里都出现了“泪花子”[①]。而与之相反的是，卖馍失败后，他却能在县城的文化馆获得放松，通过看报消解了自己不得已作为农民的屈辱性想象。“看报”这一行为，对于高加林施加的符号性意义，从他初中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时就已经开始了。规范的体育锻炼、阅读《人民日报》、充满香皂味的整洁衣服、校徽、想象中的汽车声，这些全部都在作为外界的文化性象征符号重塑着高加林的自我认知。高加林的城市性认同亦是建立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下的——即使现实中无人评判，他仍然无法逃离象征秩序的约束，他的身份认同始终是一个“被观看的自我”。

如果说高加林通过知识经验建立的自我认同中还包含现代性想象的部分，那么通过“走后门”而获得的通讯干事的职位则更具实际意义。一份现代而非传统、知识性而非劳力性的体面工作，为高加林的城市想象提供了合法性保障，确实让他感到“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长期以来，他在城市秩序的规训下培养出的“城市人该有的行为”不再像在农村时那样格格不入，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城市的现代化空间之中，这反过来也加深了他对自身城市身份的认同。如今，他身处县城，穿“三接头皮鞋”、喝白糖水、参加篮球比赛，拥有一份体面的通讯员职业，外在形象与日常习惯都符合他理想中的“城市人”标准。

然而，所谓的“城市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为现实的标准是——拥有城市户口，或是一份稳定的城市职业，而非仅仅具备与城市文化相匹配的生活品位。高加林的工作毕竟是通过非正当途径获取的，一旦缺乏持续的社会资源支撑，他的自我认同方式就会显得脆弱不堪。当失去通讯员工作后，高加林的身份危机迅速爆发；他的所有文化营造方面的努力，在现实的社会结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显然，高加林所执着追求的文化品位，本不应是现实生活的重点，却在城乡经济差距的作用下，被塑造成一种身份区隔的符号。在这一体系中，文化不仅是知识与修养的象征，更隐含着社会地位的标记，成为衡量个体身份归属的标准之一。这种价值体系在今天或许会受到质疑，但在当时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打破的社会现实下，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单纯指责高加林的分裂，认为他“忘本”“过度追求资本主义”并不可行，而应进一步思考，这种隐含着巨大社会歧视的品味价值体系，在当代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如何被逐步削弱？文化又该如何摆脱其背后的经济意味，而回归更自由、多元的价值体系？

三、高加林的爱情悲剧：身份裂解背后的现代性矛盾

高加林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周旋与抉择，并非一个简单的“爱谁更多”的问题。高加林的性别意识深受传统小农文化的影响，即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对女性的顺从、乖巧抱有天然的期待。在与巧珍的关系中，因为巧珍对他的百依百顺，高加林的权力认知得到了满足，确立了理想中的爱情期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身处农村而产生的身份低位感。然而，当他进城成为通讯员，与黄亚萍的交往逐渐

① 路遥：《人生》，第 24—25 页。

密切后，高加林开始思考，自己是否更适合与黄亚萍建立感情，对此，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能和亚萍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共同语言又多……”[①] 其中当然包含更为紧迫的身份政治考量——黄亚萍是高加林真正进入大都市（南京）的通道，而巧珍则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对于追求扎根城市的高加林而言，黄亚萍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即使对巧珍和黄亚萍都存在真实的感情，这种感情最终又会服务于他当下的精神需求，是他对自我形象认同的投射。爱巧珍，是因为潜意识中的男性自尊，在失去教师一职导致的自尊裂解后，高加林需要通过与巧珍的爱情完成认同自洽；爱黄亚萍，则是因为她的“知识女性”形象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城市人”身份认同：当高加林身处城市空间，拥有一份正当的城市职业，自然需要一位恰当的城市女性作为自己文化品位的标识。当他在和黄亚萍的相处之时回忆起巧珍时，路遥这样描写道：“高加林一直就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因为他第一次和巧珍恋爱的时候，想起他看过的一张外国油画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很像巧珍，只是画面上的姑娘头上包着红头巾。出于一种浪漫，也出于一种纪念，虽然在这大热的夏天，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包在巧珍的头上。”[②] 即使面对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高加林也尽可能地想装扮她以完成自己的文化想象，这种无法克制的精神需求，迫使高加林最终选择了黄亚萍。

然而，黄亚萍并非巧珍，尽管她曾表示，自己喜欢高加林是因为他身上有克南所缺乏的男子气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愿意无条件顺从高加林。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相较之下自然比巧珍更为独立。高加林欣赏黄亚萍的知识性、却无法接受黄亚萍因为这种知识性而导致的权力高位。这就造成了他和黄亚萍的爱情，除却文化品位和“上流趣味”的粉饰外，只是一片废墟，无法真正满足他自身的情感需求。

高加林在巧珍与黄亚萍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他身份认同冲突的体现。他既希望维持想象界中的权力位置，又希望通过象征界塑造新的社会身份，最终却因无法完成身份整合而陷入失败。这就出现了拉康所说的异化：他无法与巧珍建立稳定的关系，因为她代表的是“落后的农村世界”；但他也无法真正爱上黄亚萍，因为她不会按照他的想象来扮演理想化的伴侣。更深层的问题则在于，高加林的价值观本身是在社会体系中被塑造的，他的“理想”来源于象征界，即城市文化所赋予的意义，但他的现实却最终无法与这一理想契合。当他因克南母亲举报，再次被迫回到农村时，所有关于城市的幻梦轰然倒塌，这才是他身份裂解最直观的时刻。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抉择失败，更是社会变革中个体在身份转型过程中的必然困境，背后呈现着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对等。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在短期内打破中国社会以相对隔离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鸿沟。户籍制度、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农村青年很难获得与城市青年同样的社会流动机会。刘小萌指出：“70 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知青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③] 户籍制度带来的壁垒如此根深蒂固，才会让高加林产生：“他从自己人间天上一般的

① 路遥：《人生》，第 163 页。

② 路遥：《人生》，第 170 页。

③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年，第 491 页。

变化中，才具体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后门’——后门，可真比前门的威力大啊”的看法。高加林对劳动的看法并不轻蔑，而是在城乡价值观的异化作用下，逐渐认同了抢走自己民办教师资格的高明楼的逻辑——正当劳动远不如权力捷径更为有效。这也表明他离真正的“知识青年”还有很远：知识无法在他身上化作“抗争性的政治力量”[①]，而只是用以佐治自我的文化符号。

在这种阶层固化的情况下，婚恋成为身份跃迁的重要手段。高加林最终抛弃巧珍，选择黄亚萍，一方面是出于身份考量，另一方面是更为现实的选择。黄亚萍对他而言，是前往南京的上升通道，而选择巧珍，意味着被滞留在农村，扎根土地，而这对他是痛苦的。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源，对于黄亚萍而言，高加林虽然身份上是农村户口，但由于阅读量大，眼界开阔，实际上已与城市人无异：“她现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②]显然，在文化青年的自我指认这一方面，黄亚萍和高加林是相同的。然而，即使高加林提供了某种文化资本，黄亚萍的权力仍完全依赖于父母，在黄亚萍的父母眼里，甚至在克南的母亲眼里，高加林显然缺乏任何社会资本，这就导致了悲剧的必然产生，他所能依靠的仅仅只是单薄的爱情。

人生之难，难在理想自我的恒久撕裂，以及现实欲望的永不满足。即使故事结尾，当高加林重返农村，看似要接受命运的惩罚时，路遥也安排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得益于善良的巧珍和高家村人民，高加林似乎可以继续在中学教书。结尾处“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③]中国农民特有的淳朴与善良，感化了高加林，似乎标识着他对传统土地的回归。但这一结局某种程度上逃避了身份认同的整合问题及其现实路径，即如果没有父老乡亲的帮助，或者说开头的事情再次上演，高加林要怎么在精神上接受这一切。如何给广大拥有相同困境的青年提供一个范本，这仍然是未知的。对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同样有着强烈的高自尊，也对城市的知识文化饱含憧憬和向往，也曾在城乡夹缝、阶层跨越与精神追求的激烈冲突中出现身份危机，即使白天背石头，夜晚也要读《悲惨世界》，用书籍和日记构建精神堡垒，试图以知识和思想超越身份的卑微。然而，孙少平最终不同于高加林的地方在于，他接受了自己的劳动者身份，放弃调离煤矿的机会，主动选择回到井下，接受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从抗拒煤矿工人的身份，到最终主动选择成为一名矿工，显示了他在象征界中的自我调整，并最终实现自我赋权，构建新的主体性。这也表示，当时代转变带来的现实困境无法以个人力量去撼动时，只有改变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

高加林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悲剧，更是中国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无数人命运的缩影。作为一个在农村出生、接受现代教育并渴望融入城市社会的青年，他的自我认同在“想象界”对城市文化的憧憬与“象征界”现实秩序的冲突之间不断拉扯。高加林的自尊依赖于他者的认可，而他的身份合法性又受限于社会结构的规训，最终导致其自我认同的失落和现实归属的失败。在当

① 董丽敏：《知识/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重读〈人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② 路遥《人生》，第 158 页。

③ 路遥《人生》，第 248 页。

代社会，尽管城乡二元结构已逐渐弱化，但身份焦虑依然存在。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仍然是路遥提出的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路遥 . 人生 [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2012: 7-248.

[2] 刘小萌 . 中国知青史 · 大潮：1966—1980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 2009: 491.

[3]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2018: 10.

[4] 董丽敏 . 知识 / 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 : 重读《人生》[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6).

[5] 刘文 . 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 [J]. 学术交流 , 2006 (7).

[6] 陈林 .《人生》的现代想象与身份焦虑 [J]. 小说评论 , 2016 (4).

[7] 何浩 . 人文之眼：以 1950 年代的历史 — 文学经验为出发点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020 (11).

[8] 郜元宝 . 从 “ 城乡交叉地带 ” 到 “ 城乡共同体 ”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转换 [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2024 (6).

[9] 陆珂珂 . “ 城乡交叉地带 ”下的“ 矛盾 ”与“ 超越 ” ：以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为例 [J]. 芒种 , 2022 (9).

作者简介：

周子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2024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